

新时代史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历史发展的最新篇章，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新时代史研究，能够为正确理解和认识新时代历史发展提供有力的学理支撑和学术支持。尤其是随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进程的不断推进，把新时代史研究提上日程、协同推进新时代史研究越发重要和紧迫。

科学界定新时代史研究的内涵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目前，“新时代”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使用得极为广泛，社会接受度也较高。相形之下，“新时代史”“新时代史研究”尚不多见。

新时代，特指党的十八大以来召开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被赋予全新内涵。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史，指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2024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第十二条明确提出要学习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在党政文献中，新时代的历史、新时代历史方位、新时代历史发展、新时代历史使命等用法都出现过。上述用法的出现，为新时代史概念的提出做了必要准备。新时代的历史，其表述有两种，分别为“新时代历史”或“新时代史”，而使用“新时代史”呢？这个问题要从概念严谨性上来考虑。使用“新时代历史”，势必会有“新时代历史研究”。而新时代历史研究，又有两种不同理解：其一是新时代历



□ 储著武

重视新时代史研究

史的研究，其重点放在新时代历史发展的问题上，在此新时代是作为一个本体性的话语；其二是新时代的历史研究，其重点放在历史研究上，既包括新时代史研究，也包括新时代古代史研究、新时代近代史研究等，在此新时代是作为一个时间性的修饰语。从这个角度来说，直接使用“新时代史”这个表述，可避免造成歧义。

因此，新时代史研究，特指的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史学研究，旨在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历史发展的进程、特点与经验，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历史发展的规律及其演变逻辑。

新时代、新时代史、新时代史研究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新时代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史是客观发展的历史，新时代史研究则是对新时代历史认知的结果。它们之间的先后逻辑是先有新时代，后有新时代史，最后才有新时代史研究。从新时代、新时代史，到新时代史研究，中间经历了从客观现实、客观历史向认知历史、建构历史的视域转换。新时代史，属于本体论范畴，是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具有唯一性和客观性，是新时代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新时代史研究，属于认识论范畴，具有主观性和思想性，是对新时代史认知的结果。新时代史研究，根源在于新时代和新时代史，是从历史维度来对新时代以及新时代史的学术建构。

新时代史研究，还需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来确定其研究边界。从宏观维度来构建新时代史研究

的边界，必须全方位、立体化、整体性地呈现出新时代历史发展的历程、成就与经验，探究新时代历史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和规律。从中观维度来构建新时代史研究的边界，要将研究视域转移到新时代历史发展中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各个部门的具体问题上来，以实证研究来阐述新时代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实现的历史性变革。从微观维度来构建新时代史研究的边界，要将研究视域继续下移至新时代历史发展更为具体性、细节性问题上来，更加注重揭示基层社会、乡土中国的发展变化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实践活动。宏观、中观、微观研究并不是相互割裂的关系，而是要进行交叉融合。

深刻认识新时代史研究的重要性

新时代史，是距离当前社会发展最近、与现实政治联系最密切的历史。开展新时代史研究，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和历史意义。

深刻认识新时代历史性成就与历史性变革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这对全党全国坚定信心、再接再厉，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好、贯彻好、发展好，更好续写发展新篇章，意义十分重大”。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包含哪些具体内容？具有哪些重要的时代价值？诸如此类问题，都需要通过深入研究来加以论证和说明。

深化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入学习领会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必须“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进程”。同样，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也必须密切结合新时代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与历史性变革。

坚定对新时代历史发展自信的需要。历史认知是历史自信的基础和前提。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信，是坚持在大历史观、正确党史观基础上贯通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历史自信。坚定对新时代历史发展的自信，不能缺少对新时代史的系统认知。而对新时代史的研究越深入、越系统，反过来也会有利于增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自觉和信心。

不断拓展新研究领域的需要。新时代史研究，与之直接相关的学科是中共党史党建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目前，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对于党的四个历史时期的研究呈现出热度递减的特征，热度最高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为薄弱的则是新时代。随着时间推移，如果不及时系统收集整理新时代的历史材料，如口述史料、基层档案等，就会湮没在时代的尘埃中。开展新时代史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培育新的学术增长点。

把握推进新时代史研究的任务

新时代史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

尽管在相关论题上已有所突破，但尚未全面系统地展开。当前，推进新时代史研究的重点是尽快实现从理念倡导到实践展开、从宣传阐释到实证研究、从重点突破到纵深发展的转变。大致来说，新时代史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协同推进。

加强顶层设计，健全新时代史研究的政策体系。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新时代史研究，积极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的贯彻落实。有关部门在制定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政策时要将新时代史研究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党史和文献研究机构、科研院所以及高校中共党史党建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要将新时代史研究纳入科研工作规划，形成稳定的研究队伍。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及各省市社科基金，要设立专项课题来支持新时代史研究。国内中共党史党建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学科要把新时代史列为重要研究方向，鼓励硕、博士研究生把新时代史作为论文选题方向，努力推进新时代史研究青年人才的培养。

系统收集整理文献史料，夯实新时代史研究的史料体系。当前，新时代史研究的史料收集整理工作已有所展开，特别是在《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以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献编辑出版方面取得显著成绩。但这些都收集整理依然是零散的、不成系统的，仅仅是浩瀚文献史料中的一小部分。从内容方面来说，举凡新时代以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国防和军队、民族宗教等领域的文献史

料，都须全面系统地收集整理。从机构方面来说，党史和文献相关研究机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相关研究机构，应大力加强新时代史研究文献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从形态方面来说，党和国家各个部门、各个领域、各个行业的文献以及各省区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文献等，既要保存文字性的文献材料，更要保存数字化的文献材料，加快建设新时代史研究的文献数据库和共享平台。

增强学术自觉意识，多维度构建新时代史研究的学术体系。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新时代史研究，将党中央关于新时代历史的重要论述转化为学术议题、研究范式，尽快编写一部权威的新时代史著作，为新时代史研究提供重要指导。抓住新时代历史性成就与历史性变革这条主线，从党和国家、各省区市、各行业、各领域、各部门之中选择出100个左右的典型案例来长期跟踪研究。推动跨学科方法融合，突破单一历史学方法局限，吸纳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研究工具，提升新时代史研究的实证性。推进学术机构建设，依托现有党史和文献研究机构、高校学院，设立专门研究机构。创造良好的学术发表环境，鼓励相关刊物设立新时代史研究栏目。推动新时代史研究成果转化为历史宣传教育的重要内容并使之进入教材。妥善处理政治与学术、研究与宣传之间的关系，坚持宣传有纪律、学术无禁区，区分好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以扎实的学术成果讲好新时代历史故事。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



照亮万里长征的思想火炬

□ 杜敏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告别瑞金，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途。在险山恶水与敌军围堵的绝境中，苏区报刊相继停刊，唯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报《红星》报，如一颗不灭的星辰，随军跋涉万里，成为长征途中唯一坚持出版的中央级报纸。《红星》报1931年12月11日创刊于江西瑞金。长征伊始，《红星》报编辑部被编在中央红军第二野战纵队，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开启了流动办报、手动油印出版的征程。长征开始后，邓小平、陆定一先后主持《红星》报，1935年8月报纸被迫停刊。在居无定所、四面受敌的艰苦环境里，《红星》报紧密结合行军作战实际，开设了“社论”“捷报”“号召”“铁锤”“卫生常识”等栏目，及时传达中央指示、报道战斗消息、普及行军常识，在统一红军思想、鼓舞部队士气、团结群众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传达中央战略意图的重要“喉舌”

《红星》报始终把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抓实思想政治工作作为首要任务，让全军第一时间明晰作战方向，成为党中央、中革军委战略意图直接而有力的传达者。

长征初期，受“左”倾错误影响，战略转移缺乏充分的政治动员，不少指战员对行军方向心存困惑。1934年10月20日，长征开始后《红星》报第1期便刊发文章《突破敌人封锁线 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阐明了红军战略转移的必要性，号召“消灭南面敌人的乌龟壳，突破敌人的封锁线”。随着战局演变，党中央不断调整作战方向与建立根据地的设想，《红星》报始终紧跟党中央决策，清晰记录中央红军长征途中落脚点的数次重大变化。1934年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召开的猴场会议，确立了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根据地的行动方针。1935年1月15日，《红

星》报随即刊发社论，指出“建立川黔新苏区根据地是最近政治工作的中心”。遵义会议后，面对敌军重兵合围，党中央决定在川黔滇边机动作战。1935年2月10日第9期社论传达了建立云贵川边新苏区的指令，1935年3月4日第11期社论又传达了建立黔北新苏区的决定。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后，1935年5月22日第17期社论发布了抢渡大渡河、开辟川西北苏区的战略安排。1935年6月两河口会议确定主力红军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1935年7月10日第25期发表社论《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 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全面解读北上作战优势与行动要求，还指出了创造川陕甘新苏区的有利条件。

《红星》报是最早公开发布、传播遵义会议精神的权威报刊。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实现了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2月10日，张闻天在云南省扎西（今威信）县召开的军委纵队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了会议决议。2月19日《红星》报第10期刊发《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决议案》，指出会议“一致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而“这一错误路线的主要负责人华夫（李德）同志与□□（指博古，因当时规定团以上干部会中才能宣布博古的名字，故此处未点名）同志”。随后，3月4日第11期社论《准备继续作战，消灭周纵队和四川军阀》指出，红军连夺桐梓、遵义二城和娄山关天险，取得了“我中央红军从反攻以来空前的大胜利”，而这一胜利是“采取了正确的军事领导之后的胜利”。社论的刊发让全军深刻领会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坚定了跟随党中央、继续奋勇作战的必胜信念。

提振士气与凝聚军心的纽带

大量一线官兵亲笔撰写的战地通讯登上报端，质朴文字留存了多场决

定性战役，动人的英雄事迹成为提振全军士气的强大精神力量。

1935年1月1日，红军强渡乌江，打响长征首场大胜。1月15日出版的《红星》报刊发通讯《伟大的开始——一九三五年的第一个战斗》，还原了红军“不怕一切险阻强渡过河”的渡江场景，同时也指出此次胜利得益于战斗动员充分、干部能以身作则以及火力能和运动配合等。同版《军委奖励乌江战斗中的英雄》一文公示了毛正（振）华等22名立功英雄的名单。这些极简的文字报道与英雄姓名如乌江的水一样永远地流传于后世。

1935年5月，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突破天险封锁，摆脱生死绝境。1935年5月30日第18期《红星》报整版刊发《我们已经胜利的渡过了大渡河——四个先头团的英勇战绩》。通讯分四个部分详细还原四个先头团的英勇战斗全过程：具有“铁一般的意志，火一般的热情，猛虎一般的勇猛”的“牲”团（红1团）17个勇士强渡天险；“冲”团（红5团）以“一天走一百六十里追击敌人”的行军速度牵制敌人；“勇”团（红4团）“用了坚决迅速的行动”，与“牲”团（红3团）配合作战，“对着敌人就猛打猛冲”，最终夺取泸定桥。报道以白描手法还原惊险战局，彰显了红军统一指挥、密切配合、联合作战的优良作风，生动诠释了红军不怕牺牲、向死而生的英雄气概。

1935年6月，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红星》报连续推出专题宣传，全力营造两军互助团结的浓厚舆论氛围。6月11日第20期《红星》报刊发《同四方面军会合去！》，文章指出“争取两大红军主力迅速会合，成为野战军当前的中心战斗任务”。6月15日第21期《红星》报发表重磅社论《伟大的会合》，称“这是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件，是决定中国苏维埃运动今后发展的事件”。报纸上还刊发了《两大主力会合歌》，并特意为生僻字标注读音、划分节拍，方便全体战士传唱，

成为两军同心的精神象征。

为促进两军融合、凝聚团结合力，报纸开辟专栏号召两大方面军相互学习，要“学习红四方面军以少胜多顽强作战的精神”，也要“发扬红一方面军机动灵活猛打猛追的特长”，刊载《兄弟的友爱，阶级的团结》等通讯，报道两军相互开展慰问活动的情况，并持续报道联欢晚会、文艺汇演等场景。正如报纸所载，“这是阶级友爱的热情，这是阶级团结的精神，这是我们的力量”。

服务红军与发动群众的号角

《红星》报以通俗易懂的实用宣传为官兵排忧解难，又以严明的纪律宣导与平等的民族政策发动群众、争取民心，真正发挥了“宣传队”与“播种机”的历史作用。

《红星》报紧盯行军中的现实难题，切实解决战士衣食、健康等各类急难问题。长征初期，不少战士赤脚长途跋涉，伤病多发。1934年11月14日第4期《红星》报刊发《怎样解决草鞋问题？》，明确保障穿鞋是巩固部队战斗力的基础，提出有计划地采购、使用旧衣物打鞋以及发动战友们互助编织草鞋等三条可行办法，“做到没有一人打赤脚的”。为应对行军疲劳，第7期报纸提出可以从保证粮食供给、在行军中严格执行休息规定以及尽量不露营地等方面着手。针对常见的伤风咳嗽、感冒、疟疾等疾病，报纸也提出“不吃冷水”、多食蔬菜、注意保暖等防治措施。另外，报纸还普及防空避险、爱护武器等实用知识，引导指战员科学应对恶劣环境。

《红星》报将动员、团结群众作为核心宣传任务。1934年11月第3期刊发《关于目前地方居民中的工作》社论，要求红军要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必须以最通俗的语言，极大的耐心，同群众接近，来启发他们的斗争”，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工作，“只有红军的高度觉悟与阶级

纪律的模范，才会造成红军在群众中的威信与敬爱”。同月7日，报纸还推出红星号外，出台诸如不私分土豪财物、损坏群众物件必赔偿、上门板掘禾草等七条纪律，提出“创造争取群众工作的模范连队”。

此外，报纸还大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争取少数民族群众的信任与支持。1934年12月第6期《红星》报刊发了1934年11月29日总政治部发出的《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提出反对压迫、民族平等、不干涉内部事务等一系列基本主张，并要求各级政治部要根据“各地不同的环境与不同的情况，加以具体化、通俗化”。这也成为红军经过民族地区进行民族工作的总指导方针。1935年4月，红军长征即将进入彝区，要强渡大渡河就必须争取彝民的支持。因此，1935年4月10日第14期《红星》报刊发了《注意争取彝民的工作》，要求各部队要特别注意，一是不打彝族的土豪；二是写标语、口头宣传等，向彝民群众说明红军的主张，揭露国民党的欺骗宣传。《红星》报的这些报道，在准确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争取少数民族群众对红军长征进行支援方面，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引导作用。

作为独一无二的长征一手原始史料，《红星》报见证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转折与浴血征程。它用一字一句镌刻革命信仰，用一文一版见证苦难辉煌。它不仅是传达党中央与中革军委战略部署的“喉舌”，更以其独特的办报实践，在党史与报史上书写了一段关于信仰与坚守的光辉篇章。这份战火中淬炼的办报初心与奋斗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

